

# 黄河上游的马家窑彩陶,为何与黑海的彩陶“撞衫”?

本报记者张钦、张百慧、张玉洁

黄河上游,洮河岸边,冬日里的小山村马家窑宁静安详。

5000多年前,这里的先民用脚下的泥土,将人类史前彩陶艺术推向高峰。

近百年前,伴随考古学家的脚步,马家窑文化石破天惊。从此,一批批中外考古学家纷至沓来,孜孜以求于文明的“基因测序”。

为什么史前中国彩陶文化的高峰,会出现在苍凉的黄土高坡?

为什么远在东亚的马家窑彩陶风格,竟与黑海地区、南亚次大陆上的彩陶“撞衫”?

为什么在丝绸之路之前,就可能存在一条由史前先民“凿通”的“彩陶之路”?

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百年诞辰。马家窑文化,一个以彩陶为特色的文化类型,也日益迸射出独特魅力,因史前“敦煌”般的作用,吸引世界的目光。

## 黄河上游的中华文明探源特色独具

如果驱车西进,走进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流域,焦黄红褐的高山一望无际,宛如连绵排列的彩陶器皿。走进这一带任何一个省、市、县级博物馆,光彩夺目的马家窑彩陶一定会映入你的眼帘:

浓亮如漆的黑彩、红彩、白彩,绘制在橙黄色的陶底上,形成灵动的水波纹、漩涡纹、网格纹。罐、壶、盆等丰富的器形和光滑细腻的外表,更让彩陶多了几分优雅。

彩陶,是马家窑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中国对史前文化的科学探索肇始于彩陶的发现,也贯穿着对彩陶的思索和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话题之一,便是中国彩陶文化来源之谜。而距今约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则为破解这一谜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和革新思路。

5000多年前,马家窑文化在西北地区形成,以黄河上游及洮河、湟水流域为中心地带,迅速发展。

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首先来到临洮县马家窑村的史前人类遗址进行考察,并命名为“甘肃仰韶文化”。刚刚完成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的安特生,发现了中国彩陶与中亚和黑海两岸彩陶的相似性,“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就此产生。安特生甘肃一行的目的,就是想在这沟通中西的关键节点上,找到连



马家窑彩陶文创产品。本报记者张玉洁摄

接西方彩陶和中原彩陶的证据。

20世纪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夏鼐重访马家窑,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将其命名为“马家窑文化”。近百年来,对马家窑文化的深度研究,推翻了“西来说”。

“马家窑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一脉相承,是5000年前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的见证,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研究马家窑文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周静说,彩陶发源于新石器时代,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彩陶,达到了自仰韶文化以来的彩陶艺术高峰。

“彩陶艺术高峰不仅指出了更高的审美需求,发展出了如水波纹之类的写实手法,更表明当时已出现以制作彩陶为职业的社会分工。而专业化分工是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周静说。

在周静看来,马家窑彩陶犹如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北气候条件较好,有利于农业和发展。这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上海大学教授林少雄看来,彩陶的出现,

意味着笔、墨等基本工具已经“到位”;纹饰的绘画,更意味着线条的发明。“正是在这一笔一画的传承中,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扬光大、开拓创新。”林少雄说。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彩陶文化发展的高地。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许多史前文明类型都是以西北地区大量出土彩陶的村落命名的。一些专家学者表示,不排除彩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艺术基因的塑造性影响。

马家窑文化对中国其他文化类型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现有考古成果表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自古至今,经过此起彼伏地发展和相互交流,形成一个文化体。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郎树德说,马家窑文化早期由河湟地区向西、向南发展,曾南传至四川北部,对后来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产生影响;中晚期则往北、向西传播,曾发展至新疆东部。

在许多学者看来,这片西北舞台不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互动的重要一员,更承担了史前“敦煌”般的作用。

“马家窑先民们第一次开辟了西北地区广大的生存空间,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李新伟说,“在这里,东西方文明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为考古界带来很多惊喜。”

## 史前“撞衫”与“彩陶之路”

随着科技、环境、材料等多学科介入考古领域,学者从马家窑文化中解读出的信息也愈发多彩。

近几年,李新伟不仅经常来到甘肃洮河两岸实地考古,还远赴数千公里之外的罗马尼亚、乌克兰一带开展工作。

这是为了破解一个谜题:黄河上游的彩陶纹饰为什么会和黑海地区的彩陶“撞衫”呢?

以黑海西部和西北部为中心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彩陶的大繁荣。令人称奇的是,两地彩陶在纹饰和器型上都高度相似,风格相近,它们常运用弧线三角和平行斜线的组合,也都做陶塑人头像。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汤惠生说,从纹饰、器形推测,马家窑文化与印度哈拉帕文化也可能存在交流互动。因为各自的彩陶上都绘有菱格纹、三角纹等。远隔千里的两种文化在器物盖子形态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桩桩史前“撞衫”事件,激发了考古学界对于“彩陶之路”的兴趣。这是偶然巧合,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远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史前时期,是否就有一条“彩陶之路”,引发过横跨欧亚大陆的艺术浪潮?

按照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的定义,“彩陶之路”是史前时期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和早期西方文化相互交流之路,包括顺此通道中西方文化在金属器、农作物、家畜、宗教、艺术、思想等诸多方面的交流。其中,彩陶从西到东的影响至少可达中国甘青地区,从东向西的影响至少可到中亚南部和克什米尔地区。

韩建业认为,“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前身,对早期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丝绸之路沿线多国都有彩陶文明的出现,都有相似的文明形式和文化表达。这为丝绸之路的连接和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李新伟说。

## 世界的马家窑期待世界的目光

数千年前,从洮河沿岸到黑海沿岸,史前人类相距万里、天各一方。他们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更没有手机、卫星,是如何实现密切的交流互动的?“彩陶之路”究竟是一条贸易之路、技术传播之路,还是先民迁徙之路?

许多学者表示目前难以给出确定回答。因为在两大文化体之间的中亚地带,尚未发现起到桥梁作用的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表示:“究竟是文化的直接影响,还是不同地区人们的心智发展到了相同的水准?就目前来看,传播路径还存在缺环。”

多位受访学者坦言,史前文化还有许多谜题待解,史前记忆需要共同唤醒。

相似的彩陶文化背后,是相似的农业社会。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是欧亚大陆两端史前农耕文明的代表,就像“量子纠缠”一样,几乎同时兴起、同时衰落。

然而,前者的农业社会在解体后逐步形成了畜牧经济和游牧经济,而后者通过与其它地区的互动,在吸收畜牧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农业经济,并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独特文化。

“造成两大文化相似性的原因,以及两个相似文化体走上不同发展历程的原因,都值得深入探究。这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李新伟说。

基于对同一谜底的渴求,中国与罗马尼亚的考古学者曾对罗马尼亚一处农业村落遗址进行联合挖掘。

近几年,中国考古学家还对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文化彩陶展开研究,探讨其与中国彩陶相似的锯齿纹。

在中国专家“走出去”的同时,许多海外专家也被“请进来”。近几年,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等多家国外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来到黄河上游,与中亚国家一道进行考察。

李新伟表示,马家窑文化和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工作是当今中外合作的重要窗口。“我们希望,相关国际合作在为我们引进新技术、新理念的同时,也让这项地区研究放在更具国际化的背景下展开——既面向我国的中原地带,也面向辽阔的亚欧草原。”

推广。达尔文对此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于这是能够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品种,因此成为有价值的了”。

毋庸置疑,稻米和稻作北传促进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交流,最终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 放诸四海的传播

2000余年前,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越人为逃避战乱,渡海到了日本九州一带,把水稻栽培技术也带了过去。这是日本有稻作栽培之始,从事种稻的人被称为弥生人,稻作所引发的文化,称为“弥生文化”。日语“稻(いのこ)”,即是古代吴越称水稻为“伊缓”(音)的保留。在此以前,日本一直处于渔猎采集时期,即“绳文文化”时期。

明清以前的很长时期里,日本水稻种植都以中国为榜样。12—13世纪中国“大唐米”水稻品种被引进到日本,在日本围海造田中大显身手,成为“低湿地种植不可缺少的品种”。同样受到中国稻作文化影响的还有朝鲜。源于中国宋代的旱地育秧技术传入朝鲜之后,被称之为“干稻”,并出现在其17世纪的农书中。

随着海运交通的发展,再加上当地气候的便利,稻作往东南亚的传播亦势不可挡,最终形成了所谓的环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化,也就是农业语言传播形成了南岛语族,渐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太平洋岛屿的文化格局。整个过程如蝴蝶效应一般,不知哪一步就影响了哪个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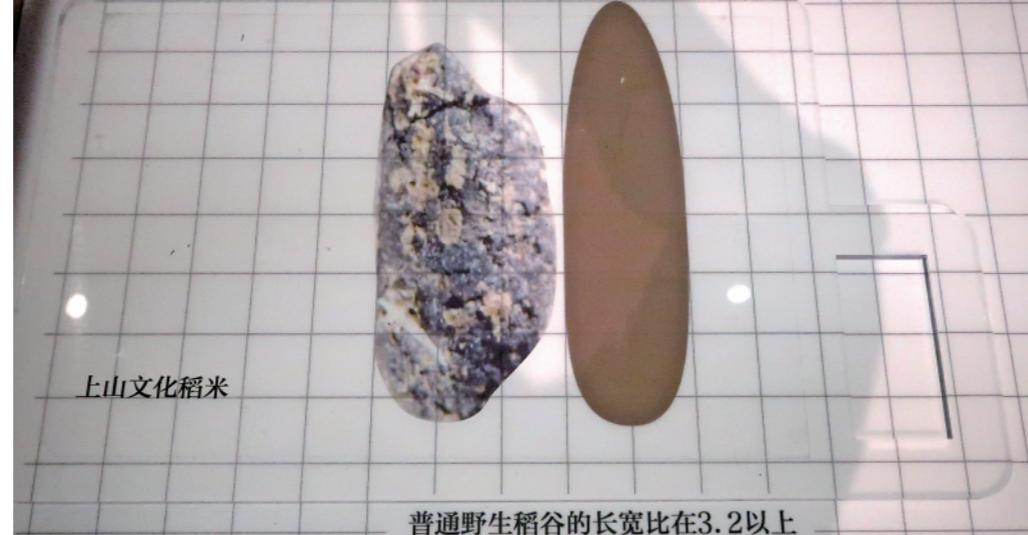
比如为了水田耕作方便,唐代江东一带出现了一种新工具——江东犁,操作灵活又快捷。17世纪荷兰人在爪哇等地看到当地中国移民使用这种犁,很快将其引入荷兰,对欧洲近代犁的改进有重要影响。吸收中国犁特点之后形成的犁耕体系,成为西方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

另一个有意思例子是“出口转内销”的籼稻,现在大家都知道印度恒河流域是籼稻的起源地,已有距今5000年左右明确的驯化证据。但籼稻最初是中国的粳稻传到了南亚次大陆,跟当地原始野生稻进行杂交形成的,这已在遗传学上证明,只是还无法讨论清楚南下路线。有的说是沿河西走廊从帕米尔高原下行经过印度河流域的,还有说法是走横断山脉穿西南地区经东南亚大陆再传过去的。

一粒古稻嚼出百般滋味,再回到展厅,每一块展板都灵动起来,陶片里嵌的稻壳仿佛轻唱着古老的歌谣。再端起一碗饭时,似乎应该更虔诚些,致敬它赋岁月以文明。

参考书目:《中国稻史研究》《科学编年史》

## 中华文明连绵不绝,有个奥秘应知“稻”



上山文化发现的稻米和普通野生稻谷外形对比。本报记者李牧鸣摄

态、社会分化程度和陶器群发生的变化,这几者的关系将会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亮点。

可持续的、单一的演化。上山文化遂发展成为东亚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农耕聚落群。

从世界范围看,尽管西亚地区早在距今12000年前后就开始出现村落和栽培农作物,但在长达数千年的实践中,仍以单个遗址小规模社群为主体。到了距今8500年之后,各种遗存的丰富程度才足以用区域文化来命名。

文化诞生正是因农业发展而形成的分工,先人从最原始的手工业开始创造出一个个传世之作。譬如展览“那一抹红”单元中的彩陶上,俨然有了各种图腾与卦符,甚至还有“田”字符号。

另一件精美的椭圆肚细高颈陶瓶,经研究证明是储酒用品,酿酒原料推测有水稻、薏米和块茎植物。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教授提出,为什么这么早的时期,陶器多样化和栽培谷物一同出现就有酒了呢?这是长期以来的争论话题——农业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足够人吃呢?还是用这些栽培的粮食去制作一些特殊的食品比如酒?酒的功能不是填饱肚子,而是作为一种中介物,是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同时也是连接人与神、人与祖先的中介。或许就是这种原始的互动需求,同时孕育了(酿酒)技术与(巫术)文化。

## 与众不同的作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岭介绍,稻是人类历史上利用的唯一的湿地衍生植物。现有的农作物主要分两大类,除了稻以外,就是利用夏季季风或者夏季降雨生长的作物,从中国的粟黍到印度原生的各种小米,包括非洲的高粱、珍珠粟甚至美洲的玉米都是这一大类,属旱地植物。小麦、大麦、燕麦等要越冬的作物也一样。先民走向旷野开始耕作,一般会选择改造居住环境中发现的植物,而稻子却是人们有意识利用湿地特殊环境时,才会发现和利用的植物,也就是说是根据环境“育种”,而不是偶尔发现“这个可吃,种种看”。

这种“定向育种”放在一万年前,挑战性不言而喻。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驯化作物除了稻,其他类别的野生稻本全都是野生稻,比如小米的“祖先”狗尾草,路边常见,习性很容易被人类发现。稻子不一样,特别是粳稻,它的野生稻本是多年生宿根繁殖为主的植物,能开花,但不一定每年结实,被人类改造后才变成脱离宿根性且高产的作物。

展厅最醒目位置陈列着一颗一万多岁的炭化稻米,已经是驯化的产物。上山人用了多长时间完成这个过程?目前研究成果表明,在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期的桥头遗址时期,稻米已经达到80%的驯化率。而原产于西亚的作物都是经过了几千年才逐渐完成驯化的,越来越多的线索让科学家重新考虑驯化的速率和整个世界对驯化的定义。

解谜这种快速驯化,势将对研究农业起源的模式有推动性甚至颠覆性的意义。

秦岭在开展当日的学术研讨会上剧透,北大文博考古学院的邓振华和上山文化发现者蒋乐平,正合作同期陶片里掺杂的稻壳、穗轴做Micro CT,再定量化研究,希望尽快拿出一些初步成果,讨论为什么上山的稻作最早发源的上山,凭借长江下游的优势位置,一直进行着